

【专题论文】

先生之风
——马华教育家王宓文教育实践与杜威教育哲学之间的承继脉络

Remembering Wang Fo-wen, Educator and Scholar
A Brief Look at His Prominent Career and the Influence of John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章星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Ina Zhang Xing Ho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E-mail: xinghong001@ntu.edu.sg

Published online: 30 June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Xing Hong, I. Z. (2021). 先生之风 ——马华教育家王宓文教育实践与杜威教育哲学之间的承继脉络.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1), 101-137.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1.6.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1.6.2021>

摘要

王宓文（1903-1972）是新马地区知名教育家，在百年前南来文化人的课题研究上是一名份量甚重的历史人物，在马来亚华文教育课题的研究上尤为不可绕过。¹王宓文为马华教育的一生，长达40余载，前后处于三个不同位置，即华校教师、政府华校视学官以及独立华文学校校长，为马华教育生存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王宓文在马华杏坛的数十年，经历了自1920年代中期英殖民执政时期到战后马来亚去殖独立的不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为离散华人研究以及区域社会和知识历史，著有《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1964）》、《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等。

¹本论文写在知名马华教育家王宓文（1903.4.18-1972.2.7）辞世50周年前夕。藉此论文发表机会，作者感谢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主席、王宓文之子王赓武教授于2018-2020年间接受本人数次口述访问，并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同时感谢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本人作为访问学者期间提供的良好研究环境。在新加坡、柔佛新山、怡保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及口述访问过程中，作者曾多次得到马来西亚资深文史研究者吴华先生（已故）、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安焕然教授、柔佛新山资深报人舒庆祥先生、柔佛宽柔中学前校长张拔川先生，及前马来亚华校总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后人的鼎力支持与热心协助，在此再次深表谢意。同时作者感谢曾以各种方式协助过此研究项目的前辈与友人。

历史时段，这恰亦是马华教育从“华侨教育”过渡并演变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全过程，而王宓文并非被动目睹者，而是一名全程参与者，在战后殖民和后殖民不同时期的纷杂教育环境中，坚守其“第三立场”，力求把马来亚华文学校建成“开放给所有马来亚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华办学校”。本文根据殖民地档案资料、旧日报章、家人回忆录手稿及口述访问，聚焦马来西亚华文运动中两个重要时刻，即战后紧急状态时期华文师资培训及新村华校的设立，以及五六十年代之交华文独立中学的应运而生，尝试诠释王宓文被誉为“战后华校师训班之父”和“马华独中首位掌舵人”的时空背景和历史含义。教育家王宓文的现代教育理念与实践，受到在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哲学的启迪，并在马来（西）亚华教的艰辛经营历程中逐渐成熟，在在凸显出与杜威教育哲学之间的一条师承脉络。

关键词：王宓文，马华教育，杜威教育哲学，新村华校，独立华文中学

Abstract

Wang Fo-Wen (1903-1972) was a prominent educator in Malaysia's education history, distinguished in particular by an incredible career of some four decades in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Studying in the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Nanking of China where he was trained as a bilingual educationist, Wang Fo-Wen was imbued with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of renowned American educator John Dewey and his Chinese student Tao Hsing-chih; and upon graduation, Wang signed up for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was sent to British Malaya (then to Dutch Indonesia) to teach in Chinese high schools in the 1920s. This paper traces Wang Fo-Wen's life trajectory in Malay(si)a, by examining the three vastly different, if not contrasting, roles that he assumed in Malayan Chinese educ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her life, respectively as Chinese-language high school teacher in the 1920s-30s, Chinese Schools Inspector in the 1930s-50s, and as principal of Foon Yew High School, the first independent Chinese high school in the country's post-independence education system. By looking closely at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respectively highlighted by the "Malayan Emergency" at the turn of the 1940-50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uniform national curriculum in 1956, in which Wang Wo-Fen was affectionately referred to as "Father of Teachers Training Classes" and "Pioneering Man at the Helm for 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 by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uccessiv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ang Fo-Wen's views of modern education were enlightened by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and Tao Hsing-chih, shaped in the midst of the tumultuous times faced by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and were eventually elevated and evolved to Wang's own unique outlook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Malaysia.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schools in Chinese New Villages, independent Chinese high schools in Malaysia

引言

我们全马华文教育界同仁，很景仰王（宓文）先生的为人，他品德敦厚，不但是我们的良师，同时也是我们的益友，任何人凡是有机会和王先生接近的，都会受他的人格感化，不由得衷心地对他起了莫大的敬意，古人称赞黄叔度说“汪汪若千顷之陂”，“三日不见使人鄙劣之心复萌”，王先生实在具有这种伟大的人格。

——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师总会主席林连玉，1955年7月²

1958年4月16日，南洋大学教育学会邀请马来西亚资深教育家、前马来亚政府华校总视学官王宓文，为南洋大学师生和公众人士作了一场学术演讲，题目是“马来亚华文教育问题”。演讲过后的第二天，《南洋商报》在“新加坡新闻”版报导了是次演讲，并全文刊载演讲稿。编者在引语中称誉该场演讲“内容丰富，见解精辟”，值得“介绍给关心马来亚华文教育的人士”一读。³

在是次有关马华教育现状与未来的演讲中，王宓文提及不少当时华社对马来亚华文教育的热点关注，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一点出尤具深意，凸显出在后殖民政权执政下马华教育正处于愈发严峻的“挫中求存”之困境。⁴在这场演讲中，王宓文首先把“马来亚华文教育”这一课题，置于刚刚独立的马来亚联邦的整体文化政策和教育宗旨的框架之下。在他看来，马来亚是个“复民族的国家，当然马来亚的文化也是一个复文化”。在这个复文化中，“马来亚中华文化”便是一个组成部分，“是马来亚大多数华人根据传统，已成习惯，而共同遵守的语言、文字、艺术、信仰、学术思想以及一切风俗习惯的综合体”。⁵正如中华文化已是马来亚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华文学校也已渐成为马来亚整体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因此马来亚中华文化的“复性地位”亦不可忽视。有鉴于此，王宓文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给出以下的定义：

“马来亚华文教育”是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各级学校，遵照马来亚教育宗旨，同时根据执政党所订而为各民族所同意的教育政策，斟酌各地情形，依照各该

² “联邦教育界代表二百余人欢钱侯士与王宓文林连玉致词谓像他们这样人才在现政府机关中确为凤毛麟角”，新加坡《南洋商报》，1955年7月10日，页10。原文出自《后汉书·黄宪传》：“‘日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叔度汪汪若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³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8年4月17日，页6-7。

⁴ 有关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及主要课题，见 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2001)。《教总成立卅三年: 华文教育史料》上册, 页32。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雪兰莪: 中华大会堂, 1991), 页55-56。

⁵ 王宓文于1958年4月16日在南洋大学发表的演讲全文, 题为“马来亚华文教育”, 刊载于1958年4月17日《南洋商报》, 页6-7。

地或全马大多数华人合理的愿望，尽量求发展，并与其他民族学校共同努力，以造就适应马来亚建国大业以及将来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的教育。⁶

在这个定义下，王宓文具体提出了当前马华教育面对的“几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包括准国民中学的学制问题、考试问题、超龄生问题等。在改制问题上，王宓文指出“最困难的是学制的更改”，因为高中三年的年数会减少一年，“这和南大不衔接”，“同时也破坏了华文学校的传统”。在考试问题上，王宓文说“既可以各民族文字为教学媒介而教学内容也相同，为什么一定要参加以英文出题的初级文凭考试和以英文出题的马来亚教育文凭考试？”在超龄生问题上，王宓文郑重地提出，“这一问题也是对于一部分的学生的前途关系很大”。他告诉听众，新加坡在这方面已有解决的措施，即设立“官立华文中学”，而“联合邦似乎还没有机制”。

1958年可谓马来亚华文教育的一个关键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政府制定的新教育政策，直接关乎华校“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是次演讲中，王宓文一方面就马华教育面临困境谈及的种种思考，带出他对后殖民政权下华文教育之未来的担忧；另一方面，王宓文也在演讲中提醒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在负起承先启后、发展中华文化的同时，华文学校“不仅自身的努力，并且应当注意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及互相了解。这其实是有别于主流的另一把声音，既有别于执政当局的政策，也有别于华语社群的抗争要求，显示出王宓文在这一议题上的“第三立场”。尽管这把声音在当时显得相对含蓄也略显微弱，然而今天回望仍能体察出他对马华教育的深层思考、对马华教育的多年感情和强烈责任感。

在研究马来西亚华教运动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社多位学者曾对王宓文在独立华文中学宽柔中学的诸多建树做过研究，⁷资料翔实可贵、研究论述中肯，记录了王宓文于1959-1969年出掌独立宽柔中学的十年，学者郑良树更曾以“一代醇儒”之称定义这位资深教育家。⁸然而迄今学界对王宓文在马华教育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现有研究都集中在王宓文出任华文独中校长的十年，而对作为华校教师的王宓文、对任职华校视学官的王宓文，都尚缺具有学术分量的学术研究。本文拟基于前人对王宓文在华文独中教育方面之贡献的研究，结合王宓文在中国期间的学识养成，透过细看王宓文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两地教育实践中扮演的三个角色，并尝试分析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对王宓文的影响。

⁶王宓文于1958年4月16日在南洋大学发表的演讲全文，题为“马来亚华文教育”，刊载于1958年4月17日《南洋商报》，页6-7。

⁷有关王宓文出任柔佛宽柔中学校长时期的建树研究，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郑良树主编，《宽柔论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6）。郑良树、安焕然合著《宽柔纪事本末》（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李志贤，《理想与现实的妥协——以宽柔中学学制演变及教学理念为例》，页59。郑良树主编，《宽柔论集》，页55-81。安焕然主编《百年宽柔：宽柔学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柔佛：南方大学学院：宽柔中学，2013）。宽柔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编辑《宽柔五十年纪念刊》（柔佛新山：柔佛新山宽柔中小学董事会，1963）。

⁸“一代醇儒”一词始见于《宽柔纪事本末》一书第十八节。见郑良树、安焕然合著《宽柔纪事本末》，页185-208。

本文尝试回答的研究问题是：王宓文是如何受到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启迪？面对马来亚华文教育的现实环境和特点，王宓文是否能延承（甚至改良）杜威/陶行知教育思想，这些延承与改良表现在哪些方面？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具体审视王宓文的具体教育实践，一是了解教育家王宓文如何结合马来亚华文教育的现实，延承并在地改良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并在其本人教育实践中付诸实施。二是回溯王宓文如何以自己一生在马华杏坛的耕耘，让马华独中教育系统成全为一种社会力量，确保马华教育的生存、提升与延续；三是回望王宓文作为兼受东西方教育的华族知识分子，如何在殖民政府战后教育政策⁹、后殖民新兴政权文化政策¹⁰的面前，坚守马华教育的“第三立场”，即力求把马来亚华文学校建成“开放给所有马来亚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华办学校”，而非“只对华人开发、仅为满足华社需要的纯华人学校”。

就研究资料而言，近百年前有关南来文化人的历史资料因年代久远，加之当年未能完整保留，以致今日研究的原始材料（primary sources）极为欠缺。本文所依之原始研究资料中，有王宓文的诗词题赋、演讲稿及序言，其中大多载于《王宓文先生纪念集·惕斋烬余稿》，¹¹王夫人丁俨的回忆记述《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及《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¹²王赓武回忆录 *Home Is Not Here*（中译本《家园何处是》）和 *Home Is Where We Are*（中译本《心安即是家》）、¹³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图书馆之“王赓武教授典藏”¹⁴，以及本人对王赓武所作的数次口述历史访问。¹⁵官方档

⁹有关英殖民政府在战后的马来亚教育政策，见 C. M. Cattersn,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4(2), 1945, pp. 251-253. J. B. P. R, *Education in Malaya. The World Today*, Vol. 12, No. 9, 1956, pp. 379-386. Silcock, T. H, *Policy for Malaya 1952.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28(4), 1952, pp.445-451. Hirschman, C, *Educational Patterns in Colonial Malay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6(3), 1972, pp.486-502. Pannu, P,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Colonial Malay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7(3), 2009, pp.427-451. Sai, S.-M., *Educating multicultural Citizens Colonial Nationalism, Imperial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in Late Colonial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44(1), 2013, pp.49-73.

¹⁰有关马来西亚后殖民新兴政权的文化政策，见 Rachel Leow, *Taming Babel: Language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Samuel, M., Tee, M., & Symaco, L, *Education in Malay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Vol. 39). Springer Singapore Pte. Limited, 2017. Postlethwaite, T., & Thomas, R, *Schooling in the ASEAN Reg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edited by T. Neville Postlethwaite and R. Murray Thomas(United Kingdom: Pergamon Press, 1980)

¹¹王赓武编，《王宓文先生纪念集·惕斋烬余稿》（非卖品），1973。

¹²丁俨女士手稿《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及《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由王赓武提供。此份原始手稿为丁俨女士为记录丈夫王宓文行谊事迹亲撰并手书，完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原文本无标点符号，本论文引文中的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

¹³Wang Gungwu, *Home Is Not He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Wang Gungwu with Margaret Wang, *Home Is Where We A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20)

¹⁴“The Professor Wang Gungwu Collection”，Singapore ISEAS Library.

案资料主要是英属海峡殖民地档案，然而由于殖民地官方档案多在政策制定的层面，与政府教育部视学官及其具体工作相关的历史资料，目前仍在搜集及挖掘中。此外，一手研究资料也包括新马地区中英文报章的相关报导，以及当地华文中学的早年出版刊物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人迄今对教育家王宓文研究中，当年新马两份华文大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构成了本论文所依据之一手研究资料中的最大宗，其多年对两地华文教育的报导为苦无原始资料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贵原始材料。¹⁶

教育家王宓文为马华教育的一生，宜从不同视角加以审视，包括王宓文所处的时代及其家世背景、杜威教育哲学对王氏教育实践的影响，以及在马来（西）亚华教环境下王宓文如何把理念付诸实现。依此思路，本文重点分四个部分探讨，第一部分论及王宓文所在的时代及其家世背景，分析其在大学期间受到的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启迪，尝试勾勒出隐于其间的师承脉络。第二部分着墨于王宓文在马华杏坛 40 年中曾亲历的三个角色——华文中学教师、华校视学官和华文独中校长，基于不同的教育平台和视角以阐释王氏的学识涵养及其马华教育实践。第三及第四部分将借着马华社群及马华教育界赋予王宓文的两个尊称，即“师训班之父”和“独中掌舵人”，聚焦王氏教育生涯中的两个亮点，透过审视王氏在 40 年代末战后至“紧急状态”时期以及 50 年代末马华教育危机期间的具体作为，以凸显其在严峻而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为马华文教育作出的独特贡献。

一、家世、时代与师承

王宓文，字艺初，号惕斋，于清光绪 29 年（1903）4 月 18 日生于江苏省泰县一个士大夫家庭。他五岁入私塾，13 岁时进入新式学堂，后赴武昌就读武昌高等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8 岁中学毕业随即投考南京东南大学预科班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京高师），获两间学校录取后王宓文选择了后者，皆因“食宿均可免费，在家中经济不宽裕之情形下亦可稍减负担”。¹⁷王宓文考入南京高师的 1921 年，正值两校并校，合并后的国立南京东南大学是当年规模甚大的综合大学，涵盖文理与农工商教育等学科，教师阵容强大。

在大学就读的四年间，王宓文与其同学们可谓“西风东渐”后受益的一代，身历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思维交锋的震撼，意识到“盖以当世士夫，咸重经济之学”、“知己必先知彼，庶可跻国家于富强之境”的道理。¹⁸王宓文主修教育及英文文学，教育专业师从陶行知（Tao Hsing-chih, 1891-1946），而文学专业则修读吴宓（1894-1978）

¹⁵作者于 2018-2020 年间为王赓武所做的数次口述访问。

¹⁶《南洋商报》（新加坡）和《星洲日报》（新加坡）。迄今掌握到的最早华文报章报导，是 1933 年 12 月 9 日《南洋商报》报导，题为“李仲乾先生书画展览宣言”，¹⁶文中首见提及“霹雳副视学官王君艺初”。艺初为王宓文的字。

¹⁷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 2。

¹⁸丁俨，《先考艺初公家传》，刊于王赓武编，《王宓文纪念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意室，2002），页 xxiv。

和美籍学人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 1887-1987）的西洋文学课程，尤为欣赏后者的文学底蕴与学识。¹⁹

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改革潮流始于晚清，以 1905 年废科举、全国广设西式学堂为标志。然而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转机的到来，要到 1920-30 年代一大批在美留学生学成归国之时。他们代表了那个年代知识群体中“蜕变中的一代”²⁰，带回来大量新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于是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实验在全国汇集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和教育救国的思潮……。”²¹在这批近代留美归国的中国学生中，不少曾就读于美国知名哥伦比亚大学（简称哥大）、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而 20-30 年代在教育理论和实施方面深具影响力、被美国学界誉为“最重要的教育哲学家”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²²便任教于哥大教育学系，门下学生众多。都已传播和实施杜威教育哲学为己任，因此有了“杜威学派”或“杜威学人”（the Dewey School）一说。当年杜氏门下学生中，也有当时在美国修读教育教育和人文科的中国留学生，比如胡适、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都是“直接及间接传承杜氏思想”。这些“杜威学派”留学生返国后，分别任教于当时中国学界两大支柱——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南京高师，后来也是他们全力促成了杜威夫妇于 1919 年的访华行程，“促使中国出现了‘杜威热’及‘杜威实验在中国’（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的现象”。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们当中的陶行知、陈鹤琴等持续致力于推动乡村平民教育和儿童教育，这些都维持和深化了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的影响。²³

说到从杜威到陶行知的传承脉络，²⁴陶行知于 1914-1917 年在美国求学，而这数年间“正值杜威教育学最为成熟的创作时期”，无疑陶行知在哥大学习到的教育理论“对他日后教育思想的创建，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²⁵杜威的理论有三个要点，即“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及“在做中学”，简言之即“教育是生活的过

¹⁹美籍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1923 年抵达南京东南大学教书，见 Bert Stern 著、马小悟、余婉卉译，《温德先生》（*Winter in China: An American Life*）（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页 42。

²⁰Wang Yi Chu,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p. 378-421.

²¹徐志辉，〈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复兴〉。见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页 3-17。

²²有关杜威教育哲学，见 Paul Arthur Schilpp,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 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North Carolina: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39). John Dewey & F.W. Garforth, *John Dewey: Selected Educational Writings*,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F.W. Garforth. (Portsmouth: Heinemann, 1966). Jay Martin,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a Biogra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²³区志坚，〈杜威思想在南方——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了解〉，见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页 50-104。

²⁴有关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陶行知全集》，方明主编（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²⁵赵雨乐，〈生活教育在乡校——论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见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页 18-49。

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学校是个进行“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的特别环境，“学校的第一任务是教儿童在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生活，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分担的责任，使他在适应社会方面有个良好的开端”；而“在做中学”讲求的是排除由于外部强制或命令的行动，强调的是“自主活动”概念。²⁶不过，陶行知在传承杜威理论的过程中，“野心较诸杜威更大”——把杜威理念里的“教育”和“生活”的两个概念“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教育”，同时也把“在做中学”改为“教学做合一”。他的这番改造，出自其不满足于学校教育生活仅是未来社会的准备，而是认为乡村生活应直接被视为教育的实际环境，即“生活就是教育”之说，他认为惟此才能“将学校与社会的藩篱打破”，这样的教育理念才能切合和适应中国乡村的现实状况。²⁷

对陶行知的这番改造是否超越了杜威这一课题上，目前学界尚无共识。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认为陶行知正视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上超越了杜威；而孔斐力（Philip A. Kuhn）看法恰好相反，他认为陶行知对杜威理论的改造过于理想，反而不符合现状，这种“企图以榜样和信念来改造社会”的举动“从一开始既定是要失败的”。²⁸

1921年王宓文进入南京高师时，该校刚开始开始逐步过渡而为东南大学（该时期简称南高/东大时期），原本的教育科扩大为教育系，陶行知继续出任系主任一职位。正是在大学求学期间，王宓文直接在主修教授陶行知那里，首次接触到教育家杜威的“实用教育”理念；而杜威“提倡从儿童天性出发，促进儿童个性发展”的教育思想可谓对王宓文日后的教育实践尤具影响。在其往后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王氏曾多次提及杜威的教育哲学并将之付诸实施，这体现在他于“紧急状态”时期推动华校教师培训、独立后出任首间华文独中校长的实践中。此点在本文第三及第四部分将有具体论述。

有论者指出，陶行知任教的南高/东大时期正是他教育思想的萌芽期，他在南高/东大任教的六年间曾发表的文章与演讲记录显示出五个主要关注点，即试验精神、师范教育、教学方法、女子教育和教育行政管理与制度。而他的教学方式在当时来说相当前卫且实用，即引入社会调查的方法，指导学生自行就教育的各个层面如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行政等开展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写成调查报告，投稿到报章发表，借此把学校和社会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让教育更为“实用”。这个教学方法，让王宓文感到受益良多，以致他30多年后出掌独立宽柔中学时也要求每一名毕业生在学习的最后一年完成一篇论文，从选题、调查到研究，以此配用学生的学以致用的能

²⁶赵雨乐，〈生活教育在乡校——论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见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页18-49。

²⁷赵雨乐，〈生活教育在乡校——论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页18-49。

²⁸费正清，〈陶行知与杜威〉，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页397。Philip Kuhn, “Tao Hsing-chih, 1891-1946, An Educational Reformer” in *Papers on China*, vol. 13, Harvard University, 1959, pp. 163-195.；两文均转载自区志坚，《杜威思想在南方——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了解》，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页50-104。

力。²⁹当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曾言：“夫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³⁰

而陶行知推行的平民教育，也始于南高/东大时期。平民教育运动（Mass Education Movement）是在 20-30 年代出现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一大批“平教”教材应运而生。³¹对陶行知而言，平民教育的主要教导对象是乡下贫民、平民及女子，而平民教育本事就是一场平民读书的运动，目的是让平民一面读点书，一面学“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培养他们公民生活的能力，并给与增进个人生活的工具”。³²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年的教育改革浪潮中，平民教育与海外华侨教育并驾齐驱，国民政府制定了华侨教育政策，鼓励年轻人远赴海外投身华侨教育，以提高海外侨胞的文化水平。在陶行知等推行平民教育的教育工作者眼中，华侨教育即为平民教育的一部分。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总会编撰的《市民千字课》里，就有《华侨》一课，课文写道：

凡我中华同胞，侨居在国外的，都称做华侨。华侨人数大约有八百多万，以侨居在南洋印度美国澳洲等处的为最多……他们虽然在外，可是很爱祖国。对于政治的改革，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公益，同胞的灾难，都热心捐助。这是在国内的同胞所应当知道的。³³

这让在南高/东大主修教育和英文的王宓文，对华侨教育有了初步了解。一个偶然机缘下，让王宓文走上华侨教育之路。1926 年夏，王宓文自东南大学毕业，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而无法出国深造。叔祖父王雷夏曾介绍往上海圣约翰中学任教未就，适逢同学乔一凡创立私立南京钟南中学，应乔一凡之邀到该校任教数月至年底。同年，受乔一凡之父、时任马六甲培风学校教务长³⁴的乔荫冈（约 1879- 不详）³⁵之邀，前往英属马来亚马六甲培风学校教书，自此走上了“海外侨胞教育”之路，把国内的平民教育运

²⁹甘颖轩，〈空间、资本与实践——陶行知在‘南高’和‘东大’时期的教育活动〉。区志坚，〈杜威思想在南方——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了解〉，见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页 208-235。

³⁰牛力，〈倔强的少数：西洋文学系与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聚散〉，《民国研究》第 35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版，页 163-181。

³¹郭双林，〈20 世纪 20 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史学月刊》，2020 年第 1 期，页 67-77。

³²区志坚，〈杜威思想在南方——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了解〉，见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页 50-104。

³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市民千字课》第 4 册，页 17。该课本首版于 1920 年代出版。转引自：郭双林，〈20 世纪 20 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史学月刊》，2020 年第 1 期，页 67-77。

³⁴1926 年 10 月，马六甲培风中学教员乔荫冈接任教务长一职。《培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马六甲，1933），页 18。

³⁵“乔荫冈先生传略”，摘自乔一凡《乔氏易传》，（台湾：中华书局，1981），页 2。该文提及，清廷废除科举时乔荫冈已 26 岁，推断乔荫冈约出生于 1879 年。

动的精髓和做法带到海外，踌躇满志地要实现自己源自大学的教育理想。

此刻的年轻王宓文并不知道，海外侨民教育这条路并不好走，他将经历战前战后和去殖三个阶段，并将在马来亚华教图景中成就三个角色，其间艰辛险阻实不为外人所道。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华文教育在英属马来亚并非只是教育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背后时时都有排斥歧视华人的“华人问题”（the Chinese Problem）在作祟。当时的他更不可能知道，无论他与家人的归乡计划如何周全，个人栖身之所总与家国危难息息相关，命运最终会把他留在南洋这片土地。

二、马华杏坛上的三个角色

自1926年踏足英属马来亚，王宓文在英属马来亚从事华文教育长达四十余载，其间不仅见证了从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也目睹了马来亚华人社群维护华文教育（简称马华教育）的艰难处境。在这漫长的四十余载中，王宓文曾亲历马华教育图景中的三个角色位置：华文中学教师、华校视学官，以及华文独中校长，每个角色有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时代赋予的特殊意义，而在每个位置上的王宓文，教育的理念始终如一，即维护并发展当地华文教育，令之有一立足之地，并贡献于当地的多元社会。

正是在这漫长的四十余载中，在马华杏坛的三个角色位置上，王宓文的马华教育理念逐渐成熟，即一方面维护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令之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立足，以求达致成为多元文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目标；另一方面，贴紧马来亚的社会现实，鼓励学生的探究与创新尝试，以培养学生离校后的社会适应力为出发点，也因此走出来一条适应严峻社会现实的华教路子。他对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延承和改造，是他在办学过程中成功引导独立中学的运作方向、处理具体学务的不可不提的前提。

（一）第一角色：华文中学教师及校长

当年在南洋华文学校执教的经历虽然不长，但在年轻的王宓文身上留下颇深印记。科班出身教育专业训练的王宓文，踌躇满志地来到南洋以后，方才察觉要实现教育改变社会的理想谈何容易。战前马来亚的华文学校并无统一管理，各校各自为政，教师聘用条件相当苛刻，而且合约通常只签一年，这让教师一职成为极为不稳定的职业，不仅薪酬不获保证，一年后若不获续约便意味着实时失业，因此为了保住饭碗，华校教师需要频繁转换学校，这一点若非王宓文亲身经历，不会有此深刻感觉。这也让他其后在不同的位置上，无论是出任华校视学官还是担任独中校长的日子里，都“素来同情”华校教师，关注教师的待遇及福利，这段在南洋地区华文中学执教和管理的经历对他影响甚深。

马来亚培风中学（1926年底-1927年中） 1926年底王宓文离开家乡，远赴南洋

的英属马来亚，在马六甲培风中学任教，学校“供食宿月薪八十元。”³⁶马六甲培风学校创立于民国二年（1913年），由华社群贤创立，逾百年来得到地方华社的厚爱与支持。该校也是马六甲州唯一的华文独立中学。据王宓文夫人丁俨回忆，“当年（1926年）底，乔君之父荫冈在南洋马六甲培风中学担任校长，邀汝父往该校担任教职，《英属马六甲华侨公立培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1935）·图表之部》里“历年教职员任期久暂表”上也能找到“王艺初”的名字。

曾任全马华教总主席的沈慕羽，在马六甲培风中学读书时曾受教于王宓文，2006年，95岁沈慕羽在南方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谈起柔佛新山文教界故人故事，其中一位便是宽柔中学的王宓文校长：

王校长曾是我初一时的老师。他是江苏人，21岁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学底深厚。王宓文校长人很高大，面色红润，戴一副黑框眼镜，温文尔雅，很像洋人……他教我们说文解字，让我们毕生在中文上“无错无别”。³⁷

新加坡华侨中学（1927年中-1928年夏）王宓文在培风中学任教半年后，同事何葆仁博士被邀出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应何葆仁之邀，王宓文随何葆仁从马六甲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于1919年由南洋商人、慈善家陈嘉庚创办，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课，乃新加坡第一所主要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的中学，也是东南亚第一所华文中学。1925年华侨中学学潮：学生对当时校长鲁士毅不满，决定罢课；1926年中，华侨中学校长换人，何葆仁上任，成为第三任校长。王宓文也随何葆仁来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

两年后的1928年夏，王宓文在南洋教书已一年有半。经家中一再来信催促，王宓文于1928年约8月间回到江苏泰州，并在泰县两间中学任教，并与江苏镇江丁家长女丁俨完婚。事实上，在1923年王宓文就读大学期间，家中长辈便开始为他物色合适妻子人选。王宓文与江苏镇江丁家长女丁俨订婚。

荷属泗水华侨中学（1929年10月-1931年12月） 1929年9月初，王宓文接到泗水荷属华侨中学的正式聘书，年底偕新婚妻子乘船转辗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王宓文抵达后方惊觉这所新校“既无校舍，又无基金经济来源，仅靠临时筹募二三万元维持一切”。开学不足半年恰逢世界经济大萧条，学校开办费用即告用罄，教职员薪水虽打八折亦无法照发。思量再三之后，王宓文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然而未能获得董事会批准，惟有竭力开源节流，一方面举办游艺会为学校筹款以开源，另一方面停止增聘教师以节流。

在泗水苦苦经营了一年后，1930年10月7日儿子赓武出世。初为人父的王宓文既要照顾妻儿，也要努力让学校渡过难关，精神及体力负荷之重可想而知。在精神体力均负荷超重情况下，王宓文一再坚辞职务返回家乡。恰在此时朋友告知马来亚怡保

³⁶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4。

³⁷陈再藩，《听沈慕羽之二》，《联合早报》（新加坡）2006年10月23日，页2。

教育局正征聘副督学（副视学官）一职，上司恰是华中前同事吴毓腾君。很快地中英俱佳的王宓文被政府教育部录用 1930 年 12 月初，王宓文夫妇带着 14 个月大的儿子赓武，坐船离开印度尼西亚泗水回到马来亚，至此王氏在南洋华校教书和办学的日子告一段落。

（二）第二角色：政府教育局华校视学官

离开荷属印度尼西亚泗水的教职，前往英属马来亚出任霹靂州华校副视学官，这意味着王宓文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角色的开始，此时的他 29 岁。英殖马来亚政府的华校视学制度始于 1923 年“华校注册条例”实施之后，在该制度下“延聘中中西文兼优之华人，充任视学员，分驻各埠，以为提学司之辅。”至 1925 年 1 月，英属马来亚各大埠均设有提学司和华人视学官，涵盖了新加坡、吉隆坡、霹靂州等，最早一批华人视学官聘自香港和新马地区，包括林泽生、陈君葆等。³⁸

霹靂州教育局华校副视学官（1932.1-1941.12）1931 年 12 月初，王宓文携妻儿离开印度尼西亚泗水，赴怡保履职，于 1932 年正式出任霹靂州教育局华校副视学官，上司是霹靂州华校视学官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前校长，即王宓文的前同事。战前政府华校视学官的最核心工作，是赴辖下各地视察华文中小学校，有时考试也会在会馆举行。³⁹主持/出席学校运动会，是华校视学官的日常工作之一，⁴⁰此外视学官也常以主礼嘉宾身份，出席华校举办的各种活动如游艺会、校庆、校舍落成礼等，并为活动主持开幕剪彩。⁴¹战争结束后，王宓文曾携家人在中国南京短暂居停，后于 1948 年 3 月回返马来亚重履霹靂州副视学官一职，并于 1948 年 3 月获擢升为霹靂州正视学官。

霹靂州华校视学官（1948-1952）在担任霹靂州视学官的四五年间（1948 年 3 月至 1952 年 6 月），英殖当局与马共游击队的对抗白热化，马来亚随即进入“紧急状态”。为了防止马共进一步渗透马来亚华校，英殖当局在“紧急状态”实施初期增加了华校视学官的职位数目。⁴²在相关学校注册条例下，华校视学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监督华校的注册情况、财政运作、课程编制、课本供应、卫生要求，以及校舍维修等。⁴³

³⁸ “政府注重华文学校各埠均设有英人提学司并设有华人视学员”，《南洋商报》（新加坡）1925 年 1 月 31 日，页 15。

³⁹ “太平区华校会考地点在太平福建会馆举行参加学校共十一间学生六十名主试王宓文监试”，《南洋商报》（新加坡）1936 年 12 月 4 日，页 12。

⁴⁰ “太平新港门培才学校游艺热闹情况，成绩优越表演动人观众拥挤哄动一时”，《南洋商报》（新加坡）1934 年 6 月 26 日，页 9。

⁴¹ “隆半山芭中华辟智学校新校舍开幕志盛”《南洋商报》（新加坡）1952 年 8 月 11 日，页 7。

⁴² “Minutes of Conference of Superintendents, Chief Inspectors, Inspectors of Chinese Schools Held at the Fed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Kuala Lumpur on 12th and 13th August 1953”, in Selangor Education Chinese File No: 11/48. 档案资料转引自 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etaling Jaya: SIRD, 2020), p. 99, 121.

⁴³ ‘Some Notes on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s’, June 1950, in ‘Chinese Education-

当年由霹靂州华文视学官王宓文掌管之华校视学官部门的工作范围，从当年的工作通告亦可见一斑。1948年7月初，马来亚联邦华校总视学官费里斯比（当时吴毓腾为助理总视学官），召集各州华校视学官在吉隆坡开联席会议。会上讨论的事宜有七点，可视为“紧急状态”宣布之前各州华校视学官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继续改编教科书；学生转学，校方应出具中途离校证明，以防接收方学校收取来路不明的学生；每年年杪提供账目报告，以决定来年学校经费；拟定华校教授之英文课程；学校及教职员注册事宜；年初中及师范班考试办法；以及保障华校教员办法。⁴⁴

这段战后华校工作千头万绪，王宓文每天都非常忙碌。据王赓武回忆，这段时期是其父在政府任职期间最为忙碌劳累，但也最有建树、最有满足感的一段日子。有关王宓文于战后推动霹靂州华校师范教育的课题，将于第四节详述。

全马华校总视学官（1952年3月-1955年6月） 1952年3月，时任马来亚华校总视学官的吴毓腾退休，王宓文为继任人，1952年3月赴吉隆坡上任。据王夫人丁俨回忆，新位置上的王宓文工作“不甚愉快”，皆因“当时政府政策对华校诸多压抑，而管理华校者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处理”。⁴⁵这段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根据《方吴报告书》的“马来亚化”建议修改新马华文华文教科书。1952年3月，当局委定18人组成华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编辑工作，其编辑、出版、发行三机构均在新加坡设立。⁴⁶王宓文除了参加审查小组会议，列席咨询委员会会议，也亲自动手编撰和翻译华校教科书，经手完成的有《马来亚地理》和《马来西亚地理》⁴⁷。

担任全马华校总视学官期间，王宓文得以站在一个相当特别的位置、以大多数人无从企及的视角，近距离地看到马来亚华文教育在不同政体的教育政策下所处之困境。进入1950年代，随着英殖民政府主导的马来亚本土化进程的推进，《巴恩报告书》（The Barnes Report, 1951）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主旨是停办母语小学，以族群混合、采用统一学制、并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学校”取而代之。这意味着今后联合邦只有英巫源流国民型小学，而华印源流私人小学将逐渐消失。此举引来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弹，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今称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应运而生。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然而马华教育面临的不利处境，并未因联合邦的独立而有所改进；相反地，在这个多族群、多语言社会中，联合邦的本

General', File No: SCA Pahang: 20/51. 档案资料转引自 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p. 99, 121.

⁴⁴ “马联合邦各州视学官集隆开联席会议议决继续改编教科书保障华校教员办法亦已通过”，《南洋商报》（新加坡）1948年7月10日，页7。这个联席会议的主席是马来亚联邦华校总视学官费里斯比，出席的有助理总视学官吴毓腾、新加坡华校视学官李之华、雪兰莪华校视学官刘怀谷、霹靂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吉打与玻璃市华校视学官吴乃聪、檳城华校视学官陈翼经、森美兰华校视学官黄仰英、马六甲华校视学官杨双德、柔佛华校视学官吴德钊，以及彭亨、吉兰丹及丁加奴华校视学官黄鸿明和古健柏。

⁴⁵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23。

⁴⁶ “星马华校中小学课本均将重新编订，教育部委定十八人负责编辑”，《南洋商报》（新加坡）1952年3月19日，页7。

⁴⁷ 课本《马来西亚地理》，出版人陈昌豪、翻译王宓文，（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6-？）。

土政权选择推行独尊单语（马来语）和单一文化（马来文化）的文化政策，意欲最后建立起一个单语文化、单语教育的马来亚社会。

与此同时，在担任马来亚华校总视学官期间，王宓文的日常工作已不再是亲手解决教育相关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如赴马来亚联邦华校，或任开幕嘉宾，或主持校庆等，⁴⁸无法亲历亲为地参与教育工作。1955年春，刚届退休年纪的王宓文向教育部申请离职，离职后于同年八月与妻子赴英国伦敦小住。在伦敦期间，王宓文“常往博物院图书馆阅览群书”，⁴⁹达成了他多年来未遂的做学问愿望。回望王宓文在刚届退休年纪之际便选择退休、离开服务多年的政府教育部，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一来因其父年前在中国老家去世无法奔丧而心情低落，二来自问20年间“仰事俯蓄，责任已尽”，实则还有第三层原因，即他已令之预感到的马来亚教育政策将有一番极大动荡，马华教育将遇上重大危机，而这一切都不是他以个人力量可以扭转的，这让王宓文感到相当苦闷。⁵⁰

不过，王宓文毕竟是一名教育家，他对教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对投身数十年的马华教育更有一份深厚感情。值得一提的是，王宓文向来受到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的尊敬，两者间一直保持良好关系。1955年年中，王宓文与教育部高级官员侯士同时退休，联邦教育界代表二百余人于同年7月在吉隆坡设宴欢饯，席间联合邦教总主席林连玉谓“像他们这样人才在现政府机关中确为凤毛麟角。”⁵¹同时，林连玉也特别提及，王宓文在身体精神尚且健旺之时，急急于退休令人感到惊讶；接着林氏他话锋一转，道出王宓文退休的真正原因：“但如果明白王君内心的苦闷，我们也会深深表示同情。”接着林连玉更寄语王宓文，希望他在英国研究甲骨文后能学成回马，“站在另一角度上，为我们华人文化作更伟大的贡献。”⁵²这便为王宓文日后参与教总工作委员会埋下伏笔，而王氏于1958年4月在南洋大学发表的就“马华教育演讲”为题的演讲，更可被视为他“以另一种身份”重回马华杏坛的一个前奏。

（三）第三角色：独立华文中学校长

王宓文于1959年初出任独立华文中学——宽柔中学的校长。此时英殖民制度经已退席，马来亚联邦刚于两年前取得独立。这在马来亚联邦反殖独立的历程上，无疑意味着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然而对马来亚华文教育而言却记录了一段艰险路程的开始。

马来亚联邦在1955-1957年取得自治独立后，马来亚联邦政府制定了“土地之子”政策，规定了马来人特权，也规定马来语为唯一国语，英语为过渡语言，而多语

⁴⁸ “隆中华中小学校庆祝卅六周年校庆”，《南洋商报》（新加坡）1955年3月22日，页9。

⁴⁹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23。

⁵⁰ 此点在王赓武的口试访问中有所提及。

⁵¹ “联邦教育界代表二百余人欢饯侯士与王宓文/林连玉致词谓像他们这样人才在现政府机关中确为凤毛麟角”，新加坡《南洋商报》，1955年7月10日，页10。

⁵² “联邦教育界代表二百余人欢饯侯士与王宓文/林连玉致词谓像他们这样人才在现政府机关中确为凤毛麟角”，新加坡《南洋商报》，1955年7月10日，页10。

社会中的华印成为辅助性语言。在这个国策指引下，文化上，战后英殖政府以“英巫语”为主的马来亚文化政策逐渐转为以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单语”马来亚文化政策。这个政策反映在马来亚的教育宗旨上，从《拉萨报告书》（1956）到《达立报告书》（1960）便是一个要求华校更改课纲与学制、成为使用英巫语之“国民学校”（简称改制）的过程，以求达致其以马来语为单一教育语言源流的“最终目标”（Ultimate Objective），即“集中各族群学童接受一个以国语，及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文的教育制度”。这不啻为马来亚华文教育在学制层面设下诸多障碍，因而导致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准国民中学学制问题、考试问题、超龄生问题等。

在这个“改制—反改制”的过程中，教总、董总和马华公会联合组成了“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也称“三大机构”），获得马来亚联邦华人社群的委托向后殖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的合理权益。对于华人社群而言，他们赞成自治及独立联邦政府的教育“马来亚化”政策，惟要求华文教育须在马来亚国民教育制度中“占有适当和相当于其价值的地位”，更是不赞同在还未及解决华校学制、高初级文凭考试语言、超龄生等问题之前，便强硬地要求华文中学改制。从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政府教育司多次去函全马多间华文中学要求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鉴于此“三大机构”发出守护华校、维持华文教育完整性的呼吁，然而不少华文中学仍相继选择向政府申请改制。⁵³

就在这个关乎马来亚华校存亡的关键时刻，柔佛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于同年12月19日登报，率先公布其拒绝向政府申请改制的决定。自此宽柔中学成为全马首间经费自筹的独立华文中学，这也意味着该校能够延续华校的“六三三”学制、以华语作为考试语言，以及继续接纳超龄生就读。此举无疑为其他不欲改制的华文中学打开了另一条路；当然，这是更为艰难曲折、无人能保证必定引向成功的一条路。

在这个大背景下，王宓文接受了宽柔中学董事会的诚恳邀请，于1959年1月正式出任宽柔中学的校长，肩上压力之重可想而知。然而在这场危机中，王宓文看到了生机，眼前正是让华校自此走出一条新生之路的难得时机。他这份让华文教育走出生天的信念，来自其对马华教育境况的长期深层思考，以及他在马华杏坛三个角色位置上的实践与经验，认为要保证独立华文中学的生存、要他人找不到消除华文中学的借口，唯一的途径便是基于杜威“教育即社会”的理念，促进华校的自我提升，令自己成为马来亚中学运作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

再者，王宓文尤为重视初等和中等教育，视之为一个人的“基础育成”，这一点上明显受到杜威/陶行知教育理念的影响。杜威曾说，由于儿童学习经验足以影响日后身心成长，初等至中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应被视为“育人的先决条件”。⁵⁴他曾说：“窃意处今之世，中等教育乃以最重要之阶段。”⁵⁵于是王宓文起而行之、埋头工作，把杜威教育哲学及具体理念融入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实践中去。在出任校长的十年里，王宓

⁵³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页99-153。

⁵⁴赵雨乐，〈生活教育在乡校——论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页18-49。

⁵⁵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柔佛新山：宽柔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1963），页3。

文尽力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含量，在学术治校、教学质量、教师素质、学生能力、学校设施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以杜威的“教育即社会”理念作为办学宗旨，力求“让每名孩子都具备适应马来亚社会的能力”。王宓文在十年里所做的这一切，为宽柔中学接下来超过半世纪的成功运作打下厚实的“学术办学”基础。

具体谈及父亲王宓文的现代教育理念与实践，王赓武说：“（先父的教育理念）重点在给学生多样发挥个人本事的学习环境，叫他们能在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社会，掌握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精通两种或三种语言。教育要向外，尽本能，这才使学生离校后能应付现代化的生活需要。”说到父亲对宽柔中学的贡献，王赓武也说父亲生前多次提到，在宽柔中学工作的十年，是他一生办教育中“真正办教育的十年，也是这一生的圆满结局”，这是因为“一方面父亲认为在宽柔的十年，他能帮助马华的独中教育系统成全为一种社会力量，一方面又有机会建立他向来重视的现代化教育理想。”⁵⁶

三、王宓文华教实践之一：“战后华校师训班之父”（1946-1955）

在王宓文的马华教育实践中，战后推动马来亚霹靂州华校师资训练班的角色，为马华教育历史留下份量极重的一卷记录，也是其马华杏坛上个人生涯里的重彩一笔。

战后五年，是马来亚各类学校恢复元气的关键时期，而其中华文学校面临之问题甚为艰巨而繁多。当年华文报章有这样的记载：“战后侨校面对之困难，如校舍之重整，校具之购置，经费只筹划，与乎补救师资之恐慌等等，殆皆为目前最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之问题。”⁵⁷在这些诸多迫切问题之中，经费不足和师资缺乏是两个最大问题。1946年战后马来亚联邦各地的华英巫印学校中，惟见华文源流学校（简称华校）深受合格教师不足之苦，这个“教师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战后亚洲重新洗牌的政治版图，尤以1949大陆政权易手后的一段时期更为明显，皆因当时英属马来亚当局收紧了人员出入境相关规定，中国大陆也开始关闭国门。在政治情势主导一切的战后马来亚，输自中国的最大华文师资来源即被切断，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全马华文学校，尤其是华小的运作。⁵⁸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战后新马两地教育局自1946年底相继启动由政府主推的协助华校复办的计划，主要包括拨款协助华校运作和举办华校华文师资训练班（坚称师

⁵⁶安焕然，《华教需要学术奠基——谈王宓文与宽柔》，见林连玉基金（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HD）“2009华教节特辑”，2009。

⁵⁷“霹靂王副视学官对本报记者称复兴华校款将发当局核准拨助十六万五千元关于师资课本问题亦详说及”，1946年11月21日，页8。

⁵⁸有关战后马来亚华校的“教师荒”，见：“文冬若干华校大闹教师荒”，新加坡《星洲日报》，1952年1月30日，页4。“国内师资不能南来马教师荒益见严重形成若干学校争聘教员风气”，新加坡《南洋商报》，1952年2月7日，页7。“威省新村闹教师荒”，新加坡《星洲日报》，1952年3月18日，页6。

训班)两项。1946年11月7日,新加坡教育局率先发出通告促请各间学校教员向当局申请注册,当局也同时宣布会为尚不符合注册资格的教师开设华语师资训练班(简称师训班),比照英语师训班做法不收学费,拟定1947年开课。

在马来亚联邦,霹靂州是华校最多的州份最多之一,因此受其波及的范围和程度也相对较大。继新加坡教育局率先于1946年11月7日宣布开办华语师训班后,⁵⁹霹靂州教育局于同月21日宣布举办校师训班,成为马来亚联邦最早宣布开办华校师训班的州府,而直接负责推动该项计划的教育局官员便是时任霹靂州华校副视学官的王宓文。⁶⁰在就师训班事宜接受记者访问时,王宓文说“战后华校师资之缺乏,乃不容否认之事实”,当局拨款设师资训练班“以供未合资格规定之教员攻读……(乃)有意栽培此辈,使彼等能有执教之机会”。王宓文同时也告诉记者:“将来师训班之创设,将不止星洲一地而然,即吉隆坡、怡保及檳城等地亦将相继设立。”⁶¹

从以下王宓文夫人丁俨的回忆片段中,我们似还可看出一点,即王宓文实际上是新马地区华校师训班的最早倡导人之一。王夫人记道:

星马自和平后,各华校甚发达,班级日增而合格教师不足。汝父一再思维,只有提倡创办师训班,将初中毕业生或尚未毕业者,使其一面教书、一面在周末及假期时受训,因此造就不少师资,使不合格者成为有永久职业,从此各州效法。⁶²

1948年6月,英殖当局与马共军队武力冲突升级,当局随即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令,此举让马来亚华文教育再次因为政治情势而遭受极大冲击。在接下来的约十年间,马来亚华语源流社群可谓首当其冲,长期被指为“共党”同情者,甚至是“红色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而马来亚华校的运作亦陷入一个极为艰苦、动辄得咎的困境。身为政府教育局的华校视学官,在这样对华文教育极之不利的情况下,要如何助华校一臂之力渡过这个难关,更显示出了王宓文不仅只是负责华校工作的官员,而更多的是一名教育家在严峻现实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坚守自己对维护华文教育的一贯信念。

从目前的官方档案、报章资料和个人记录来看,战后马来亚政府主导的华校师资培训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1946年底至1948年6月“紧急状态”宣布前的华校师资培训,第二阶段是“紧急状态”法令实施后开始至1950年代中期的新村

⁵⁹ “未合注册资格之华校教员当局将予训练机会师资训练班明年即可告开始华文视学官李之华对记者谈”,《南洋商报》(新加坡),1946年11月7日,页5。“华文师资训练班将收录教师四十名参加资格经由当局公布”,《南洋商报》(新加坡)1946年12月6日,页5。

⁶⁰ “霹靂王副视学官对本报记者称复兴华校款将发当局核准拨助十六万五千元关于师资课本问题亦详说及”,《南洋商报》(新加坡),1946年11月21日,页8。

⁶¹ “霹靂王副视学官对本报记者称复兴华校款将发当局核准拨助十六万五千元关于师资课本问题亦详说及”,《南洋商报》(新加坡),1946年11月21日,页8。

⁶²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21-22。

华校师资培训。

战后华校师训班的开办，实为马华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师范教育实践，也是王宓文办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王宓文对师范教育极为重视，并在实践中延承并改良了老师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在陶行知看来，“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是旧师范教育之如何改造，新师范教育之如何建设。”⁶³同时他认为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是科学教育家”，而师范生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名“科学教育家”，因此有必要“专心致志、抱定主意、以教育为专门职业”。在陶行知眼中，师范教育份量颇重，因为从事教育者“负起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⁶⁴身为华校大州霹雳州的华校视学官，除约十个月的时间因家庭原因离开马来亚以外，⁶⁵王宓文全程参与了马来亚联邦华校师资训练工作。王宓文不仅积极倡办华校师训班，亦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为霹雳州华校师训班的成功举办付出不少心血。

（一）王宓文与华校/新村师训班

随着“紧急状态”法令实施进入第三年，英殖当局为阻断平民对马共军队的物质资助，推行了针对华族垦民的集中居住计划，即统称的“新村”计划（也称“Briggs' Plan”）。到1954年，全马来亚联邦共有约50万华人垦民迁入“新村”。新村设立之初，马华公会与基督教会便分别捐款设立新村华校。⁶⁶在霹雳州，自1950至1951年之交开始，霹雳州教育当局开始与马华公会合作，在该州各地新村设立华校，并同时开班培训新村华校教师，后者被纳入正进行中的华校师资训练计划。据马来亚联邦立法议会1952年就联邦华人新村安置及发展的白皮书，截至1952年2月，霹雳州建成的新村学校数目是各州之冠达75家，共有课室360间，报名就读的学生总数为12,507人。⁶⁷

⁶³赵雨乐，〈生活教育在乡校——论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页18-49。

⁶⁴甘颖轩，〈空间、资本与实践——陶行知在‘南高’和‘东大’时期的教育活动〉。区志坚，〈杜威思想在南方——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了解〉，页208-235。

⁶⁵1947年5月因儿子赓武的升学需要，时任霹雳州教育局华校副视学官的王宓文夫妇携子归国投考大学。王宓文夫妇于1948年3月先行返回马来亚，王宓文于同月升任霹雳州华校视学官。也见“毗视学官王宓文回国华校教师会联合饯行”，《南洋商报》（新加坡），1947年5月27日，页7。“毗叻华校视学官吴乃聪调长吉打遗缺王宓文继任”，《南洋商报》（新加坡），1948年3月28日，页8。

⁶⁶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p. 97-102.

⁶⁷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 *Resettl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illages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2*, White Paper No. 33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s, 1952), p. 13. 档案资料转引自：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 98.

作为霹靂州华校视学官的王宓文，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在“紧急状态”法令实施期间，王宓文除了在“紧急状态”情势下继续赴霹靂州各地视察华校外，⁶⁸其主要精力均放在设立新村华校、为新村华校培养师资这两项工作上。其中，建造新村学校的工作约在1951年5月展开，霹靂州政府与马华公会霹靂分会教育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分别拨款设立新村华校。⁶⁹这些新村华校“将以教授华文为主，英巫文次之。”⁷⁰

新村华校师资训练工作也在此时同步进行。鉴于不少人投函应征新村华校教席，为统一掌握新村华校教师的师资素质，霹靂州华校视学官署也是在新村教育委员会的协助下，甄选、聘用及训练新村华校教师。⁷¹

建立新村华校、训练新村华校师资是州教育部门的工作职责之一，身为霹靂州华校视学官的王宓文亲历亲为处理与新村华校相关的事宜，并常见向报章媒体通报这两项工作的最新进展：1951年9月就新村华校设立事宜接受本地华文报章访问时，王宓文表示霹靂州经已建成新村华校22所，虽然经费筹集相当困难，但仍会竭尽所能努力满足新村华族学龄孩童的教育需求；⁷²1951年6月30日，王宓文说霹靂州教育局协助新村建立学校的计划目前“已经积极进行中”，目前新村教育委员会已选出30名新村华校教员（华文28名，英文两名），经教育部批准后便能“先后派往指定地区服务”；⁷³1951年7月19日，王宓文表明新村华校师训班专为经已受聘任教、但尚未达至注册程度的教员而设。王宓文特别指出，相较于战后开始实施的华校师资训练，新村教师的培训方式很不相同：原拟定三个月为一期的训练模式，因新村华校分散各地很难集中受训，因此改为以一个月为训练期，而特别师训班则可于指定之学期休假期间举行；⁷⁴1951年7月28日，王宓文宣布来临的8月学校假期中将举办一期特别师训

⁶⁸ “毗华文正副学官巡视属下各华校”，《南洋商报》（新加坡），1949年3月26日，页8。“王视学官莅红土坎视察永宁校务”，《南洋商报》（新加坡），1949年4月27日，页7。“毗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出巡各属区华校”，《南洋商报》（新加坡），1948年9月21日，页8。

⁶⁹ 有关政府与马华公会分别拨款设立华校，见：“毗新村华校开办廿二间”，新加坡《星洲日报》，1951年9月8日，页8。“毗叻政府拨款廿五万元建新村学校马华分会组教育委会协助进行”，《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5月7日，页7。“毗教育部拨巨款协助建立新村学校获选教师下月服务”，《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6月30日，页7。“毗马华公会教育组拨款一万余元津贴新村华校”，新加坡《星洲日报》，1952年1月20日，页4。“马华公会毗叻分会拨二万六千余元资助各新村华校指定为各校建筑课室”，新加坡《星洲日报》，1952年1月10日，页8。“毗马华会教育小组批准拨款三万余建十处新村华校”，新加坡《星洲日报》，1952年10月16日，页7。

⁷⁰ “毗叻政府拨款廿五万元建新村学校马华分会组教育委会协助进行”，《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5月7日，页7。

⁷¹ “当局将聘新村教师73名请教局介绍”，《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4月27日，页7。“毗叻马华分会移殖村教育委会通过教师将由甄选委会聘任”，《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5月23日，页8。

⁷² “毗新村华校开办廿二间”，新加坡《星洲日报》，1951年2月8日，页8。“毗教育部拨巨款协助建立新村学校获选教师下月服务”，《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6月30日，页7。“毗新村华校师训班毕业会考生须知师范资格试验同时举行”，《星洲日报》，1954年1月24日，页4。

⁷³ “毗教育部拨巨款协助建立新村学校获选教师下月服务”，《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6月30日，页7。

⁷⁴ “毗教育局拟定一项计划训练新村教师惟对训练方式尚未决定”，《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7

班，训练经已受聘在霹雳州各地新村任教的教员，“训练为其一个月，地点在怡保市，在训练期间，各受训员之膳食，均由自理，而住宿问题，教育部将协助彼等解决之”。⁷⁵

从1951年8月《南洋商报》对怡保育才小学专为新村教师举办之特别师训班的报导中，我们大致可了解当年霹雳州教育部新村华校师资班的有关训练细节，其中包括学员组合、讲师资历、课程设置、时间安排，以及注册及任课要求等：

此项训练班之举行为期四周，所讲习之教育科目以实用为主。目前参加训练班之新村教师共40人，其中6名为女性。该训练班有讲师六名，负责讲述各种重要教育科目。/训练班上课时间为上午八时至中午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上午课程为教学法，下午为球类运动，并有图工及音乐等科目。/受训之新村教师于训毕后，即可暂时获得注册，任教于州内各新村中之学校。此等教师中，一部分系经被聘任者，余则准备于9月间开始工作。⁷⁶

在上述霹雳州教育部公布的细则中，特别列明训练班“所讲习之教育科目以实用为主”，这与杜威“教育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不谋而合。这个细则是否由受过教育科班训练的王宓文亲自制定，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确认。⁷⁷

进入1952年，中国国内师资的来源完全切断，马来亚华校一度出现教师荒。所幸霹雳州教育局一直大力推动师资训练计划，尤其是短期培训的新村师训班，霹雳州华校尚不至于受到过大影响。不过鉴于教师需求持续增加，霹雳州教育部也决定调整师资训练的结构。霹雳州华校视学官王宓文受访时披露，截至1952年2月霹雳州的82个华人新村中，已开办新村学校达64所，学生共14万余名，新村教师约400名。鉴于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新村师训班”行之有效，政府有意继续举办新村师资训练，并以此完全取代为期较长“华校师训班”。换言之，自1946年开始举办的华校师资训练计划，在经历了四年华校师训班和新村师训班的“双轨”运行后，于1952年开始过渡到“单轨”新村训练班。王宓文表示今后未达至注册程度的教员，即便不在新村学校服务，均可参与新村师训班的训练。王宓文补充说：

四百余名之新村教师中，师资不一，有高师、高中及初中，惟以初中之教师为居大部。由于师资之早就问题，政府须赓继“训练班”之设立。目前受训者仅约七十余名，准备而且必须受训之教师尚多也。⁷⁸

月19日，页7。

⁷⁵ “吡叻教育局将于下月举办特别师训班训练各新村教师”，《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7月28日，页7。

⁷⁶ “吡新村教师训练班昨在育才上课毕业后即可在新村学校任教”，《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8月21日，页7。

⁷⁷ “吡新村教师训练班昨在育才上课毕业后即可在新村学校任教”，《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8月21日，页7。

也是在 1952 年，王宓文升任政府教育部全马华校总视学官，于同年 6 月间赴吉隆坡就任，不得不离开他极之热爱、令之有成就感的实际教育工作。不过即便在全马华校总视学官的位置上，王宓文依然极为关注新村华校的设立和师资训练工作，多次到全马各地新村华校视察，包括霹靂州、雪兰莪州、彭亨州等。比如 1952 年 12 月王宓文前往怡保视察新村华校，认为当地新村华校校舍按照马华霹靂分会的图样建筑，“极合标准，而实值得他州效尤也”。1954 年 8 月应雪州高师同学会的邀请，前往州立学校演讲“欧游观感”。1954 年 9 月王宓文视察彭亨州西部的劳勿，当晚学员齐聚中学礼堂聆听王总视学官讲述有关游英法观感，“王氏对于游踪所及之各地特点，握要叙述，娓娓动听，历时二句钟许，使听者有如身历其境，毫无倦容。”⁷⁹

事实上，在霹靂州华校/新村师训班学员们的心目中，王宓文一直是一位以身作则、令人倍受敬重的师长，在华校师训班刚刚开设的日子里，身为霹靂州华校视学官的王宓文会在讲员不足时，亲自到校执教国文科目；每到一地视察华校期间，他会专程前往当地中学看望在那里受训的华校教师，“对于各学员之学习情况，垂询綦详”，也会应邀发表演讲。师训班学员无论是举行画展，还是开联欢会，都会邀请王宓文为他们主持剪彩开幕。王宓文夫妇离马赴欧旅行，或是游欧归来，华校师训班学员们都会组成筹委会安排送行或迎接事宜。⁸⁰王宓文夫人丁俨在为儿子赓武所记的回忆录里曾写道：“汝父对一班无力升造者大有帮助，以致称汝父为‘师训班之父’。”⁸¹

（二）王宓文与华校教师

出于早年在南洋地区华校任教的亲身经历，王宓文对华校教师的生活境况有着切身感受，也因此格外体恤华校教师的生活境况。在王宓文担任华校视学官期间，他对教师的关心和体恤，主要表现在以下数个方面：

支持合理增加教师津贴在担任霹靂州华校视学官期间，王宓文在华校教师的聘任、薪酬及福利方面花了不少心思。相较于战后英校教师薪酬水平，战后华校教师月薪普遍较低。1949 年 12 月，霹靂州华校教师联合会理事会开会议决，请求教育部增加

⁷⁸ “毗华校王视学官披露新村师资训练班，教育局有意继续举办”《南洋商报》（新加坡），1952 年 2 月 15 日，页 8。

⁷⁹ “联合邦教育局王总视学官往怡保巡视各新村华校”，新加坡《星洲日报》，1952 年 12 月 28 日，页 4。“雪州高师同学会请华校总监演讲”，新加坡《星洲日报》，1954 年 8 月 5 日，页 8。“王宓文总视学官莅劳勿视察师训班”，《南洋商报》（新加坡），1954 年 9 月 8 日，页 10。

⁸⁰ “太平华师训班继续补习半年”，《南洋商报》（新加坡），1949 年 7 月 17 日，页 7。“霹靂华校师资训练班同学会会员画展视学官主持开幕”，新加坡《星洲日报》，1951 年 11 月 12 日，页 7。“毗叻华校师资训练班同学会联欢会盛况”，《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 年 12 月 19 日，页 9。“毗新村华校师训班欢迎联邦总视学同时举行学员联欢会”，新加坡《星洲日报》，1953 年 1 月 5 日，页 4。“毗华校师训班同学会议决欢迎王宓文游欧归来成立筹委会负责进行”，《南洋商报》（新加坡），1954 年 7 月 29 日，页 11。“毗华校师训班同学将欢送王宓文赴英”，新加坡《星洲日报》，1955 年 8 月 21 日，页 9。

⁸¹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 21-22。

华校津贴，王宓文“亲临列席”听取理事会的要求。⁸²

建议组建教师职工会。1950年11月，马六甲教师会鉴于“团结教师本身，加强力量，及为促进研求教育学术起见”，发起成立全马华校教师总会，并分函各州教师会征求意见。当被问及此项倡议时，王宓文认为全马华校教师“应有总会之设立”。1951年5月，霹雳州华校教师会联合会在育才小学开会，讨论组织教师职工会一事，王宓文列席会议。⁸³

建议设立教师福利基金。1950年9月，怡华教师公会商筹集福利基金事宜，此举是响应霹雳州华校视学官王宓文有关改善教师福利的两项建议，即“筹集‘集体保险基金’及‘教师疗养基金’两项为目前重要之举”。鉴于华校教师（尤其是新村教师）薪酬待遇低等现实状况，⁸⁴王宓文于1951年8月举办的教师节联欢会上，再度呼吁社会人士和教育界本身，“切实注意教师福利问题，盖华校教师目前生活状况，应有以改进也”。他具体建议教师应自行组织“教师福利基金”，每月规定缴纳之数额，指出若按联邦五千名教师计算，月缴二元则每年可得十万元福利基金，“持此鉅款，对于解决教师福利问题，已有相当资力矣”。此外，王宓文也建议建立教师的“肺病疗养基金”，以“解决教师染肺病之治理问题”。谈及这两项教师福利机构的组织问题，王宓文认为“从事教育界者，应速进行提出加以研究，而学校之董事方面，应以予以协助，为全体华校教师谋福利”。⁸⁵

调停董教不和。王宓文年轻时在南洋华校教书的那段经历，令之深谙教师清苦无助境况。逢遇学校董事会与教师之间产生矛盾或隙嫌，王宓文总是居中调解，因此而未能处理完的公务则用晚上休息时间完成：

汝父素来同情教师，因彼等收入菲薄，生活清苦，又无保障。设董教有不和时，董部欲辞退教师，汝父竭力调解以免教师事业。但因而花费不少时间，往往搁置其他工作，不能再办公时间做完，只好带回家办理，时常做至深夜，足见汝父二次来怡五年间工作相当繁重也。⁸⁶

⁸² “请求教育部增加华校津贴事，霹华校教师联合会理事会议决，联合各校董部向政府要求并呼吁马华公会及全马教师会支援”，《南洋商报》（新加坡），1949年12月7日，页7。战后华校教师月薪一般在\$65-\$85之间，资深教师月薪为\$90-\$120。同期英文源流学校教师的薪酬为\$240-\$400。档案资料来源：Malayan Union, 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 1946, p. 28; Director of Education File No: 69/51; and Education Chinese Kelantan File No: 15/50. 档案资料转引自 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 99, p. 121.

⁸³ “吡叻教师会赞成组总会”，《南洋商报》（新加坡），1950年12月16日，页7。“吡华校教师联合会昨举行会议赞同组织教师职工会”，《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5月13日，页11。

⁸⁴ ‘Schools in Resettlement Areas’, 27 Dec. 1950, No. 6, File No: B.A. 108/1950. 档案资料转引自：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 100, p. 209.

⁸⁵ “怡华教师公会决定明日召开会员大会，商筹集福利基金及祖会所事”，《南洋商报》（新加坡）1950年9月12日。“王宓文关心教师福利认为应组二福利机构，指出联邦五千教师月缴二元则每年可得十万元以为诸般福利基金”，《南洋商报》（新加坡），1951年8月30日，页5。

⁸⁶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22。

与教师一道出席教师节庆祝活动。当年每逢教师节霹靂州不同地区的华校会集体举办庆祝活动，该项活动多会邀请华校视学官出席。比如，王宓文曾出席 1936 年太平霹靂华校教师节，以及 1940 年大战前夕的马华教师在怡保举行的教师节团结大会。⁸⁷

四、王宓文华教实践之二：“独中首位掌舵人”（1959-1969）

1959 年 1 月，经已退休的王宓文接受柔佛新山独立宽柔中学的邀请，应允出任该校校长。在这个关乎马来亚华校存亡的危急关头，王宓文深知宽柔率先宣布不申请改制，在马来亚华教未来之路上树立起一座灯塔，而自己在这个时刻受托执掌这座灯塔，不仅全马华人社群在看着他，执政者也在看着他。这是华教的危机，一步走不好，就等于马华教育将陷入更加难以摆脱的困境。

（一）就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思考

细究王宓文这一决定背后的信念和思考，有必要回到他于同年 4 月在南洋大学就“马来亚华文教育”一题所作的演讲。⁸⁸这场演讲发表的 1958 年，不仅是马来亚华校面临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也标志着王宓文个人教育生涯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开始。那场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隔日在新加坡华文报章上全文刊载，让人们看到这名前华校视学官对华文教育的守护之情。王宓文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给出的定义，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一条脉络：他特意强调了马华教育在马来亚整体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既提醒华语源流社群有必要清楚认识到“马来亚也是华人的家乡”，因此有必要“与其他民族学校共同努力”这个社会现实，也明确吁请政府谨记其制定教育政策的初衷，对各族文化及其学校都如同自己的子女般一视同仁，制定一个“为各民族所同意”、“适应马来亚建国大业”及培养“将来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之教育政策。王宓文以一个比喻来结束当晚的演讲：

政府好比是家长，各民族的文化象征民族文化的学校好比是成年的子弟，现在时代不同了，家长对于成年子弟的合理要求，心里可能不甚以为然，可是不能漠视，而不得不予以同情的考虑。⁸⁹

此时的王宓文，从全马华校视学官的位置上退下已近三年，然而他从未停止对马华教育进展的关注，也没有停止就马华教育未来命运的思考。事实上，退休后的王宓

⁸⁷ “太平霹靂华校庆祝教师节盛况或举行娱乐及聚餐或举行同人联欢会”，《南洋商报》（新加坡）1935 年 6 月 9 日，页 7。“马华教师庆祝教师节表现大团结精神站定自己岗位努力推动侨教为国树人完成抗战建国大业”，《南洋商报》（新加坡），1940 年 8 月 30 日，页 15。

⁸⁸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 29。

⁸⁹ 王宓文于 1958 年 4 月 16 日在南洋大学发表的演讲全文，题为“马来亚华文教育”，刊载于 1958 年 4 月 17 日《南洋商报》，页 6-7。

文，依然做着与马华教育紧密相关的工作：退休后与夫人在伦敦短居约一年后，王宓文回到马来亚，在暂居新加坡期间曾应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和星洲世界书局老板周星衢之邀，一边在南洋大学先修班教授国文，一边为世界书局翻译课本。1958年4-5月间，即在南洋大学演讲过后不久，王宓文应吉隆坡尊孔中学之聘，赴隆代课教授高三华文课程。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那场在南洋大学就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演讲，为他不久后接受宽柔中学董事会诚邀出任独立宽柔中学校长埋下了伏笔。正是在1958年暂居吉隆坡的日子里，王宓文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际遇——柔佛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代表亲自到吉隆坡，诚邀王氏前往新山担任独立宽柔中学的校长。⁹⁰从新近获得的一手资料来看，对是否接受宽柔中学的邀聘一事，王宓文并非没有犹豫过；事实上，华文独中可谓新生的时代产物，究竟要怎样掌管一个独立华文中学，才能保证它能立于不败之地，对这个问题王氏心里是没底的。然而，身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学教育的教育家，王宓文深知自己身负为后代打下坚实人生基础的重任。他这样谈“中学教育”的重要性：

窃意处今之世，中等教育乃以最重要之阶段。无论升学就业，其基础皆有赖焉。盖若能在中学阶段中，建立一坚实之学业基础，则进可以深造，退亦可谋生。且既有高级中学之学识水平，即不能深造，亦可自修，以充实一己之学问，如此而成就者其例至多也。本校之宗旨，亦即以此为鹄的，而两者兼顾焉。⁹¹

在探索独立华文中学办学之路的过程中，王宓文很留意摆正“社会与教育”、“独中与政府”的关系。首先，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王宓文，始终本持着杜威师就教育实用的理念，主张教育是为后代年轻人培养日后的两项能力，一是对身处之社会的适应能力，而是贡献于社会的有用才学。在《宽柔五十年纪念刊》的序言中，王宓文这样评说“社会”与“教育”的关系：

⁹⁰就王宓文当年是如何被说服而南下担任首间独立华文中学校长一事，马来西亚华文学界曾作过研究。郑良树、安焕然合著的《宽柔纪事本末》于“第十八节：一代醇儒王宓文”（页186-187）记录了数则“时人口述”，即宽柔中学董事会会长黄庆云亲赴吉隆坡诚邀王宓文担任校长一职，方式是以“先斩后奏”方式“‘求’他、‘骗’他南下的”，而其中“穿针引线的人”有说是一名叫赵亲王的人，也有说是一名与王宓文熟稔“卖花生油”的人，然二者所述均无真实姓名。出于“保存原始资料”的需要，郑、安两名学者在此处留下附记以待后人查证。基于郑、安两位学者的记录，作者结合新近获得之一手资料，在此予以补遗：据王夫人丁俨女士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中所记，1958年春吉隆坡尊孔中学高三华文教师张荃因病到新加坡就医，校方诚邀王宓文为之代课至年底，王氏夫妇因此迁居吉隆坡。在吉隆坡居住期间，“宽中董部两位代表黄庆云、陈炳凯亲来隆聘请”，个中牵线人赵君（全名赵忍庵，这与上述的“赵亲王”其人的姓氏不谋而合）。据丁俨女士记载，王宓文本意愿不高，但经丁俨女士“分析各种情形”并“一再力劝”下，应允“签约一年”。丁俨女士续写道：“以后一再续约，居然服务十年，对该校打好基础且有不少贡献，对于汝父精神与经济亦均有裨益，诚非始料所及也。”（页27-28）

⁹¹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柔佛新山：宽柔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1963），页3。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无不重视教育。即国家愈进步，社会愈发达，则教育之需要亦愈迫切。不仅求其普遍，且须延长其教育年限，提高其学识水平。故凡先进国家，一方面力求普及，兼收并蓄，无论对于团体或个人，凡致力于兴办教育者无不加以鼓励，予以协助，盖皆所以为国家社会培植人才，理之所宜然。⁹²

其次，论及独立中学与政府的关系，王宓文认为在独立后的马来亚联合邦办学，而且办的是脱离主流教育系统的独立母语学校，独中的办学目标须是“一方面不违教育当局之所规定，一方面又能具备其特有之适应性”。换言之，他主张独立中学“能以本邦当前需要为适应对象”，在得以生存和运作的前提下“培植人材……承先启后”，惟此方不愧数十年来维护华教人士的热心与苦心。他这样论述独立中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可谓拿捏得十分精准：

总之，独立中学，乃所以协助当局，冀有以往在此新邦成立之初，继续培植人才，以尽天职。故其办学目标，一方面不违教育当局之所规定，一方面又能具备其特有之适应性，俾就学青年，无论其是否超龄，无论其升学抑就业，均能以本邦当前需要为适应对象，而承先启后，复不愧对数十年来，所有为本校努力之热心人士惨淡经营之苦心。至于将来之成败利钝，则在当其时者，有以善图之，而吾人亦皆有其责焉，诚不胜其馨香而祷之矣。⁹³

在王宓文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间，正是这份对马华教育的深层思考、强烈责任感以及深厚感情，让他在离开马来亚教育领域的一个空间没多久，又回到教育领域里另一个空间——独立华文独立中学。这是一个能让他真正得以实践教育理想的广阔空间。

（二）宽柔办学的十载实践

担任独立宽柔中学的校长期间，英殖民制度已经退席，王宓文面对的是独立后马来亚（后成为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然而殊不知独立后的华教环境更显严峻，此时教育宗旨中的“最终目标”（Ultimate Objective），即“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指教学媒介语”，从《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统称《拉萨报告书》）中的“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到《1961年教育法令》中的“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除种族性的中学……”。

在这个大背景下，王宓文作为首间独立华文中学的校长，肩上压力之重可想而知。然而他相信，要保证独立华文中学能生存下来、要他人没有借口消除华文中学，

⁹²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页3。

⁹³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页3。

唯一的途径便是华校的自我提升，让自己成为优秀中学。于是王宓文再一次起而行之、埋头工作，把源自杜威教育哲学融入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实践中去，在学术治校、教学质量、教师素质、学生能力、学校设施等方面，在在为宽柔中学奠下坚实基础。王赓武回忆说，父亲王宓文生前多次提到，在宽柔中学工作的十年，是他一生办教育中“真正办教育的十年，也是这一生的圆满结局”。

摆正了独立华文中学在社会上、面对政府时的位置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让华文独中成为高质量、多元化且能与国家主流教育系统接轨的教育机构，惟此其生存与发展方能不为他人所诟病。学者安焕然认为，华校的生存与发展，与其教学素质有着“相互映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换言之，学校要立足求存、继而发展，其“学生素质、学术水平一定要提升”，惟此“华文独中教育才能开拓出一番天地”。⁹⁴提升华校的学术水平和学生素质方面，王宓文在宽柔的十年有诸多见树，可见诸于以下数个方面：

建立“三种语文并重”之学校。具体论及独立宽柔中学的办学方向和学校属性的论述，王宓文明言“本校乃三种语文并重之学校”。王氏写道：

本校独立中学，而重视华文。盖全校学生，均为华人之子弟。虽亦有一二非华人之学生，其目的乃在精习华文。本校原为华文中学，华人家庭之愿望，既须满足，而华人商店及其相互间之交往，仍有其需要。至于其他语文，亦甚注重，巫文乃为国语，更不可忽。故本校乃三种语文并重之学校。⁹⁵

这段论述，明确体现了王宓文在马来亚华校办学议题上的“第三立场”：一方面，王宓文确认宽柔中学是一间“华文学校”的基本属性，学生在此学习的“目的乃在精习华文”；同时王氏也指出即便是华人学校，亦有学习和掌握他族/他国语言之必要。

教学环境与教学方法。在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上，王宓文鼓励学生尝试掌握做学问的方法，其中一个途径便是“规定高中三学生必须撰写一篇五千字以上的毕业论文”，通过后方可予以毕业。此一创举的用意是让学生从高中开始就接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让学生多多利用图书馆资源，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增加知识。⁹⁶究其源头，王宓文此一教学方法，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许多教育家一样，受杜威所倡导的“问题解决法”（problem solving）所激发而演绎出不同形式的“专题教学法”（也称“设计教学法”）。在杜威看来，学校里学生在一定的环境中会去学习“体认环境和调适环境”，而这个“新旧经验的不断改造及增加”的过程便是学生的学习历程。⁹⁷在马来亚独立宽柔中学，“高三毕业生要写论文”这个规定，便是王宓文为学生创造出的一

⁹⁴安焕然，《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见《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⁹⁵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柔佛新山：宽柔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1963），页3。

⁹⁶郑良树、安焕然合著，《宽柔纪事本末》，页197。

⁹⁷李炳坤，〈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与专题研习〉，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页307-324。

个“学习环境”，在这个学习环境中学生们要自发地决定自己的论文方向和内容、筛选研究题目、寻找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且自己设计研究大纲、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失败沮丧中积累经验走出新路，直至论文的最后完成。时至今日，高三学生毕业前撰写论文的做法，已成为宽柔中学的学术传统之一，毕业生经此一役后升上大学都会发现自己受益不浅。

主张培养个人能力的“外向教育”。王宓文全面地开展“教育即生活”，他所主张的外向教育，旨在培养孩子个人本事，也注重从小培养国际视野。他认为，对从事马来亚华文教育者而言，培养学生对马来亚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符合社会国家建设之需要，是“从事教育者不能或忽者”。外向的教育，旨在鼓励学生透过各种与社会接轨的课内课外活动，学习生活才艺、发挥个人本事。这些活动包括体育赛事、⁹⁸童军活动、⁹⁹工艺手工艺，¹⁰⁰以及摄影知识等。¹⁰¹个人本事，也包括透过参与与他族人士互动的活动如篮球赛、国语比赛等，学习和掌握与各族人士相处的能力。¹⁰²从王宓文办学实践来看，他的理念更为贴近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他写道：

教育乃经验之改进，故有“教育即生活”之说。如何适应生活环境以及社会国家之需要，自亦从事教育者所不能或忽者也。吾人在此缅怀既往，瞻望将来之际，此亦当务之急。责任所在，自应以大者远者为重，必求无愧于天良，乃所以谋真正之幸福。吾人所造就之人才，究为何之人才，敷衍塞责，何来成绩，必全力以赴，日求精进，锲而不舍，其庶几焉。¹⁰³

培养少年人的“试验精神”。陶行知曾撰文或演讲谈论其教育理念，“试验精神”是数个主要范畴之一。他主张试验精神应纳入教育方法，认为“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在教学法上，他主张“采用杜威的思想分析法，先确定问题，再想出所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推论各种方法的可能后果，再运用效

⁹⁸ “柔佛新山宽中董事部慰劳男女篮球队”，《南洋商报》（新加坡），1961年12月2日，页13。“柔佛州校联合运会明日在峇株举行”，新加坡《星洲日报》，1959年6月25日，页11。“柔佛新山宽柔中学良友篮球队征峇株巴辖”，《南洋商报》（新加坡），1962年5月4日，页8。

⁹⁹ 1963年柔佛州童军在峇株举行大露营，王宓文是获奖者。“柔佛州童军在峇株举行大露营苏丹与童军总长致词吁各界赞助童军活动”，《南洋商报》（新加坡），1963年8月4日，页13。“黄庆云王宓文获童军勋章”，《南洋商报》（新加坡），1963年8月8日，页13。

¹⁰⁰ “柔佛州公民月学生周已开始举行副州务大臣主持开幕礼工艺品展出美不胜收劳工部长后日莅柔佛新山访问各校”，《南洋商报》（新加坡），1959年2月10日，页10。

¹⁰¹ “柔佛摄影学会近讯”，《南洋商报》（新加坡），1964年11月12日，页14。“柔佛新山宽中影会主办星马学生摄影展览”，《南洋商报》（新加坡），1967年5月4日，页12。

¹⁰² “柔佛新山苏丹钻禧堂举行国语月会话比赛熊嘉宾督学吁非巫人必须学习与使用国语各华校表演游艺节目极精彩”，《南洋商报》（新加坡），1964年6月28日，页12。“柔篮总联络各民族学校栽培篮球新血首届柔中小学锦标赛月中开始本星期六决定比赛程序”，《南洋商报》（新加坡），1961年11月3日，页8。“全柔各民族中小学篮球比赛昨隆重开幕教育局因仄亚淡氏主持开幕礼序幕赛居銮中华女中篮队告捷”，《南洋商报》（新加坡），1961年11月19日，页8。“美国名篮球教练在柔佛新山传授技艺”，《南洋商报》（新加坡），1962年7月28日，页12。

¹⁰³ 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页3。

果最好的方法并审查试用的效果，最后是印证这个方法是否屡试屡验”。陶行知的主张实际上与杜威“在做中学”理念异曲同工，即要求学生“自我行动”，而非按照老师的指示或命令而行事。这也正是王宓文在上文提及的“教育乃经验之改进”之真谛。1959年9月，也是王宓文接掌宽柔中学的第一年，学生们在物理老师带领下制作了两枚小型“火箭”，并将之命名为“宽中号”。两枚小型火箭由铁质网球筒改装，内装火箭发射所需的约一公斤中的基本燃料，外加用油印纸制成的外壳以减少潜在危险。据报导作为宽中庆祝建校46周年的活动之一，师生齐聚两次发射“火箭”但均因火箭筒爆裂而告失败。在场师生不免感觉沮丧，校长王宓文却表示试验失败不要紧，他“鼓励学生不断试验以达到成功的地步。”¹⁰⁴

“学校家庭化”。在杜威“教育即生活”主张的基础上，王宓文结合马来亚社会的特点以及华语社群的特色，提出宽柔中学的教育主张，即“学校家庭化”。王宓文详细阐释了这个主张的定义：

更有进者，华人传统最重情义，大多数华人之所以守旧者，即因于此。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深入人心。故家庭观念最为重视，若或数典忘祖，每位人所不耻。至于忠义之事，则又能奋不顾身，“移孝作忠”，事理之常。盖莫不以合乎情理之至为归。故本校有“学校家庭化”之主张。凡属学生均视若自己之子女，关怀倍切，尤望其能孝于亲，不负其父母之期望，窃以为果如是，则教育之功效，乃能益着也。¹⁰⁵

教育行政管理在现代办学理念中，教育行政管理是重要的一环。在陶行知看来，教育行政管理包括教育经费的充足、提高教员的薪酬待遇以保证其教学质素、各科教员应聘用学有专长的人才，同时办学人员也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资历。¹⁰⁶王宓文办学期间，注重宽柔中学的教师资历，招揽之人才中或持有大学以上资格，或具备丰富教学经验，均以宽中教学质量的需要为依规。同时王宓文注重提升教师地位，关心教师的福利待遇，比如改革教师聘用制度、修建教员宿舍、为长期服务宽中的教师颁发金牌、为困难教员调整其子女学费等。¹⁰⁷经费方面，王宓文主政宽中后启动师生捐款的“爱校献金运动”，呼吁学生家长慷慨解囊；他与社会合作，接受外界向学校捐款；

¹⁰⁴ “宽柔中学师生再度试放火箭因火箭筒爆裂而告失败校长王宓文表示将鼓励学生继续试验”，新加坡《南洋商报》，1959年9月21日，页9。

¹⁰⁵ 王宓文，〈序（三）〉，《宽柔五十年纪念刊》，页3。

¹⁰⁶ 甘颖轩，〈空间、资本与实践——陶行知在‘南高’和‘东大’时期的教育活动〉。区志坚，〈杜威思想在南方——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了解〉，页208-235。

¹⁰⁷ “柔佛新山宽中教员宿舍全部工程将完成建费不敷望各界赞助”，《南洋商报》（新加坡）1961年1月9日，页11。“柔佛新山宽柔中学明日开始盛大庆祝金禧纪念各界献金五万余元服务十年以上教师将获金牌”，《南洋商报》（新加坡），1963年5月17日，页13。“柔佛新山宽中董事会议通过教职员经济有困难其子女可请求免费调整教师薪金尚待研究”，《南洋商报》（新加坡）1963年7月28日，页13。

同时，宽中也举办各种活动筹款以增加学校设施。¹⁰⁸时至今日，宽柔中学的一些重要教务方针皆确立于王宓文担任校长的时代，其中“包括文理分科、三语并重、高中理科班数理采用英文课本、免费马来籍学生就读、多元化办学宗旨、注奉自发学习、品学兼重，并要求高中三学生必须撰写一篇五千字以上的毕业论文”¹⁰⁹等。至此我们可以说，王宓文承继了杜威“社会即教育”的教育哲学，而其在马华教育的实践中恪守着“第三立场”，让人们看到一条从“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再到向外开放、面向世界的多元“华办教育”的无限可能性。

王宓文接掌宽柔中学的十年间，宽中董事会自第一年起就对王宓文的治校办学“很感满意”，认为王宓文治理有方。董事会曾多次口头或书面嘉奖王宓文对宽柔的贡献，包括在1963年5月宽柔中学举办盛大庆祝金禧纪念大会上为王宓文颁发奖章。1967年，王宓文与其他22人一道，获政府颁予PPM勋章，该勋章是颁给“予新山有功的人士”。¹¹⁰丁俨女士对丈夫出任宽柔中学校长的十年有如下评说：

十年来汝父在校对教职员相处谦虚和蔼，学生如偶有违法时则用心善言训导或记过，不肯轻易开除。万不得已时令自动退学，以免有损青年前途。自己常言：动辄开除学生乃办教育之失败。汝父办学对各方诚煞费苦心，能得社会大多人士好评非偶然也。¹¹¹

结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王宓文的一生，是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的一生。自王宓文初抵英属马来亚的1926年代中期至染恙骤逝的1970年代初，四十余载间王宓文自始至终从事马来亚华文教育，其间历经英殖管治、去殖独立的不同历史阶段。他曾是20年代从中国南来的华文中学教师，见证了南洋早期现代华文中学的创立及发展；他

¹⁰⁸ 〈柔佛新山协成机器厂庆祝四十周年劳资献金及各界贺仪均归宽中，王宓文参加仪式〉，《南洋商报》1960年4月26日，页12；〈宽中体育馆筹募经费举行篮赛获款近五千，王校长主持比赛〉，《南洋商报》，1960年8月3日，页11。“董联一发言人重申决意华文中学将保持六年制”，《南洋商报》（新加坡），1959年2月15日，页10。“柔佛新山宽柔中学学生自动献金近二万元教职员亦捐献六千余元”，《南洋商报》（新加坡），1959年6月18日，页11。“柔佛新山宽柔中学师生爱校献金运动结束”，新加坡《星洲日报》，1959年6月27日，页11。“柔佛新山宽柔师生献金达二万六千余元教职员占六千元以上”，新加坡《星洲日报》，1959年7月3日，页11。

¹⁰⁹ 安焕然〈华教需要学术奠基——谈王宓文与宽柔〉，见林连玉基金（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HD）“2009 华教节 特辑”。资料出处：<https://llgcultural.com/%E5%8D%8F%E6%95%99%E9%9C%80%E8%A6%81%E5%AD%A6%E6%9C%AF%E5%A5%A0%E5%9F%BA-%E8%B0%88%E7%8E%8B%E5%AE%93%E6%96%87%E4%B8%8E%E5%AE%BD%E6%9F%94/>

¹¹⁰ 有关宽柔中学董事会对王宓文领导有方的赞许，见：“新山宽柔中学明日开始盛大庆祝金禧纪念各界献金五万余元服务十年以上教师将获金牌”，《南洋商报》（新加坡），1959年5月17日，页13。“新山宽中新董事长萧峴香获封荣衔董事部设宴庆祝”，《南洋商报》（新加坡），1960年11月22日，页11。“新山宽柔中小学昨日热烈举行庆祝金禧纪念大会各界献金逾七万元黄庆云希望热心人士再接再厉出钱出力促建大礼堂早日实现”，1963年5月19日，页13。

¹¹¹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页30-31。

曾是战前英属马来亚政府华校视学官，竭力平衡政府与华校的互动，在独特位置上守护华文教育；他也曾是马来亚独立前后的华文独立中学校长，为维护华文教育的完整而心力交瘁。

在王宓文 40 余年的马华教育生涯中，他先后以“教书、视学、掌校”的不同身份、但相同的承继于杜威的教育理念，全身心投入马华教育实践当中，每每在困境中默默维护持守着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华文教育史上留下清晰的足迹。具体而言，在战后至“紧急状态”初期，王宓文主导马来亚霹靂州的华校师资培训、推动华人新村学校的尽速设立；而在 50 年代末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华教危机中，他首肯执掌全马首间华文独立中学宽柔中学，成功地将该中学打造为高质量华文学府，为独立华文中学赢得了一块落脚之地。

本文的重点是审视王宓文的马华教育理念与实践，梳理并分析源自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在马来（西）亚华教土壤中加以改良的承继脉络，以求深入探讨王氏的马华教育理念与实践。其次，透过分析王宓文在马华杏坛的三个角色，本文呈现了王氏在马华教育领域耕耘的一生，勾勒出他力求使马华独中教育系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确保马华教育的生存提升的努力。再者，本文着重呈现一名兼受东西方教育之华族知识分子的不同视角，看他在如何坚守其“第三立场”，发出自己的另一把声音，力求把马来亚华文学校建成“开放给所有马来亚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华办学校”，而非“只对华人开发、仅为满足华社需要的纯华人学校”。

回望王宓文为马华教育的一生，本文期冀带来三层意义上的揭示和思考：其一，王宓文在马来亚为教育的一生，长达 45 载，目睹了华文教育从“华侨教育”到“马华教育”的全过程，此时兼受东西方教育理念熏陶的华族知识分子的抉择和坚守，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底蕴，也是其德性品格之写照。其二，王氏“为教育的一生之所以值得今人缅怀，在于他以不同的角色身份，一方面维护及推动华文教育在马来亚的位置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促成华校教学与独立后的国家教育政策接轨，力求让华文教育成为独立后马来亚教育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三，王宓文的一生所体现出来的，是马华教育课题上一把持续而冷静的“另一把声音”，力求把马华教育放在整体国家命运的框架下加以思考，时时提醒着执政当局和华语社群，其第三立场有别于、并超越了直接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也正是王宓文马华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可贵之处，亦为本文研究论述的初衷与重点所在。

【附文一】

王宓文行谊略述

王宓文，字艺初，号惕斋，江苏省泰县人，1903年出生于书香世家。1926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毕业，获英文系文学士学位。南来新马地区教书之前，曾在南京钟南中学任教职。

1926年年底起，先后任教于马六甲培风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校。1928年回国省亲，与丁俨女士成婚，1929年携妻赴印度尼西亚泗水，创立当地华侨中学，并任校长一职。1930年10月，儿子王赓武出世。

1931年至1932年间，获任霹靂州华校副视学官，全家迁居怡保。战后回返马来亚教育部，续任霹靂州华校副视学官。1947年6月迁居中国南京，陪伴儿子赓武就读中央大学。然因寒冬身体欠恙，于1948年4月返回马来亚怡保定居，仍任霹靂州华校副视学官。儿子赓武亦因中国内战学校关闭，于1948年年底返回马来亚怡保，并于1949年10月就读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

1948年3月升任霹靂州华校总视学官，两年后的1952年3月升任马来亚联邦华校总视学官，王家迁居吉隆坡。1955年6月从教育部退休，于英国伦敦短住一年半，其间专注研究音韵学。1956年接受新加坡书业邀请，回马出任教科书编辑顾问，并与1957-1958年间寓居新加坡。

1959年初出任柔佛州宽柔独立中学校长，迁居柔佛新山。任职宽柔校长期间，苦心经营擘划，成绩斐然；然校政繁忙之时仍兼任史地科主任，并亲自参与教学。1968年卸任后仍获该校聘为顾问，一代师表备受推崇爱戴。1970年年底，赴澳洲出席国际东方学会议。

1972年2月7日，因病于柔佛新山辞世，享年69岁。王宓文平生博览群书，赋诗作文，兼工书法，撰著已出版有《王宓文先生烬余稿》《惕斋文存》等，所著诗文向为士林所重。

【征引文献】

一、中文文献

(1) 王宓文的著述及演讲稿

王宓文著、王赓武编，《王宓文先生纪念文集》（非卖品），1973。

王赓武编，《王宓文纪念集》，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王宓文于南洋大学演讲全文，《马来亚华文教育》，原载《南洋商报》（新加坡），1958年4月17日。

王宓文，《宽柔五十年纪念刊·序》，柔佛新山：宽柔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1963。

(2) 王宓文家人回忆录

（一）王夫人丁俨女士回忆录手稿

丁俨，《略述汝父生平之遭遇及事迹》，王赓武提供。

丁俨，《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王赓武提供。

（二）王赓武回忆录

王赓武著，林纹沛译《家园何处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

王赓武、林娉婷著，夏沛然译《心安即是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

Wang Gungwu, *Home Is Not He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Wang Gungwu with Margaret Wang, *Home Is Where We A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20.

(3) 口述访问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2018-2020。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宽柔中学前校长张拔川，2019年。

(4) 华文报章资料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新加坡)

《星洲日报》Sin Chew Jit Poh (新加坡)

沈慕羽《永念王宓文老师》，见《南洋商报》，1997年7月19日，页19。

陈再藩《听沈慕羽之二》，见《联合早报》(新加坡)2006年10月23日，页2。

(5) 专著

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安焕然，《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生活篇：生命的咏叹》，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9。

_____编，《沈慕羽日记全集·第一卷（1957年）》，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3。

_____编，《历史慕羽——沈慕羽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11。

陈绿漪、陈耀泉、杜乾焕等编，《林连玉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15。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

林连玉，《风雨十八年：林连玉记事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8。

_____，《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

_____，《新马两地华教运动的相互关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2。

_____编，《宽柔论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6。

_____，《十年传灯》，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82。

郑良树、安焕然合著，《宽柔纪事本末》，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

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周佳荣、文兆坚，《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育》，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

胡适口译，《杜威的三十二堂课——胡适口译，百年前演讲精华》，台北：大块文化出版，2019。

宽柔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编，《宽柔五十年纪念刊》，新山：柔佛新山宽柔中小学董事会，1963。

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5。

廖文辉，《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7。

_____《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5。

(6) 期刊论文与特辑

牛力，〈倔强的少数：西洋文学系与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聚散〉，《民国研究》第35辑（2019年10月），页163-181。

安焕然，《华教需要学术奠基——谈王宓文与宽柔》，见林连玉基金（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HD）“2009华教节特辑”，2009。

郭双林，《20世纪20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见《史学月刊》，第1期（2020），页67-77。

二、英文文献

I. Official Records & Reports

The UK (National Archives at Kew Gardens)

CO 717, Malay states file list and index.

CO 953, Singapore file list and index.

CO 1030,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ile list and index.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B.A. 108/1950 Schools in Resettlement Areas, 1950.

Malayan Union, 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 1946.

Selangor Education Chinese File.

II. Private Papers

The Professor Wang Gungwu Collection, ISEAS Library, Singapore.

III. Official and Commissioned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Malayan Union. Annual Report, 1947.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1947.

IV. Newspapers & Journals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Malay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V. Books

Bickley, V,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A Life with the Colonial Education Service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in Asia*. Radcliffe Press, 2010.

Dewey, J, *The School and Society ; and,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 Jack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_____ & Garforth, F. *John Dewey: Selected Educational Writing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F.W. Garforth. Heinemann, 1966.

Goh, D, *Race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 edited by Daniel P.S. Goh ... [et al.]. Routledge, 2009.

Lee, T,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Martin, J,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A Biogra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ostlethwaite, T.& Thomas, R, *Schooling in the ASEAN Reg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edited by T. Neville Postlethwaite and R. Murray Thomas. Pergamon Press, 1980.

Samuel, M, Tee, M., & Symaco, L. *Education in Malay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Vol. 39). Springer Singapore Pte. Limited, 2017.

Schilpp, P,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edited by Paul Arthur Schilpp. ([1st e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39.

Tan, L,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Tan, T,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SIRD, 2020.

Taylor, T.K, *Sunset of the Empire in Malaya: A New Zealander's Life in the Colonial Education Service*. Radcliffe Press. 2006.

Teoh, K, *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VI. Book Chapters, Theses & Essays

C.M.Catters,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4.2 (April 1945), pp.251–253.

Leon Comber, "Chinese Education -- Perennial Malayan Problem," *Asian Survey*, 1.8 (October 1961), pp.30–35.

Charles Hirschman, C, "Educational Patterns in Colonial Malay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6.3 (October 1972), pp.486–502.

J. B. P. R, "Education in Malaya." *The World Today*, Vol. 12, No. 9 (September, 1956), pp. 379-386.

Philip Kuhn, "Tao Hsing-chih, 1891-1946, An Educational Reformer," in *Papers on China*, Vol. 13, Harvard University, 1959, pp. 163-195.

William McLean, "Education in Malaya."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5.3 (July 1946), pp.508–512.

Paula Pannu,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Colonial Malay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7.3 (January 2009), pp.427–451.

Victor Purcell, "The Crisis in Malayan Education." *Pacific Affairs*, 26.1 (March 1953), pp.70–76.

Sai Siew Min, "Educating Multicultural Citizens: Colonial Nationalism, Imperial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in Late Colonial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44.1 (February 2013), pp.49–73.

Silcock, T. H., "Policy for Malaya 1952."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28.4 (October 1952), pp.445–451.

Tan, L, "Tan Cheng Lock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 Issue in Malay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1 (March 1988), pp.48–61.

_____. “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the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 Working Paper No. 52,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88.

J. K. P. Watso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rowth of Education in Thailand, Malaya and Singapore”. Thesis (Ph.D.),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73.